

天津首次发现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润健）由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天津市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完成的2023年度青池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近日通过天津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评估，取得重大考古收获，首次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青池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天津考古部门曾于20世纪90年代对该遗址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存。

2015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青池遗址进行复查，发现存在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的线索。

2023年10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青池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两个发掘区内，分别揭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地层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出土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兽骨等不同质地文物标本1000余件。

青池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盛立双介绍，在青池遗址第1发掘区内发掘出旧石器遗存。根据出土遗物、地貌环境等综合推断，旧石器遗存的年代应在距今4万年至1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盛立双说，在青池遗址第11发掘区内揭露出新石器时代灰沟打破旧石器时代的层位关系，并出土重要遗物。根据出土陶器文化面貌和既往测年数据判断，新石器时代灰沟最下层遗存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绝对年代为8000年至1万年左右。

盛立双表示，本次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青池遗址打制石器与陶器、磨制石器伴出，网坠和骨针也大量出土，鹿科、牛科、犬科、鸟类、淡水鱼类等动物骨骼丰富，许多兽骨人工加工痕迹明显，显示出当时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多元的过渡性特点。

北京将设立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

据新华社电（记者罗鑫）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消息称，北京将建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督员制度和志愿者制度，支持公众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开放、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与反馈。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相关人士介绍，为加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让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支持引导机制（试行）》近日已审议通过。该机制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完善居民、社会力量等参与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代表了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根据机制，所有公众都有保护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义务，北京中轴线保护区区域内的居民对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北京将鼓励公众参与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的监督管理、行政决策、价值阐释、活化利用、资源捐赠等工作中；北京将支持公众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规划和标准等的制定与实施进行监督。

据介绍，在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前提下，北京将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为公众体验、感受北京中轴线魅力创造良好条件，鼓励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向公众开放；鼓励北京中轴线保护机构与公众共同建设北京中轴线文物主题游径，建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价值展示与阐释体系；支持公众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修缮、展示、研究、交流和传承等提供资助。

中国边疆考古 发现与研究成绩斐然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日前，第五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绩斐然。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新疆考古、西藏考古、吐谷浑考古、长白山地区古人类调查研究等重大项目持续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考古因其所涉地域范围的辽阔和文化内涵的丰富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未来，边疆考古工作要在东北史前聚落考古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等重大课题上持续发力；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学科融合，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之路；要加强边疆考古和优秀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转化。

据了解，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自2019年创办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每一届都汇聚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展示中国边疆考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举办期间，与会学者考察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三星村遗址。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发掘历史智慧 应对气候变化

200余名专家学者共论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考古学的独特视角

人类对古代气候变化的经验与当前所面临的气候危机是否有可比之处，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考古学的视角提醒我们，了解过去可以为应对现在和未来的气候变化提供宝贵经验。自然气候档案和考古研究为认识人类如何应对海平面变化、气温骤变等各种气候事件提供了独特视角。”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执行委员会的这段论述揭示了面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常忽视文化多样性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人类的生存不仅取决于生物适应，还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文化手段应对环境危机和挑战。因此，保护和记录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环境考古学教授道格拉斯·J·肯内特，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了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玛雅潘地区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揭示出干旱如何引发玛雅文明的内部冲突。这项发现获评本届论坛“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之一。可以说，考古学研究展示了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各种可能性。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彼得·比尔的研究重点是过去的气候变化、博物馆和考古遗产，他带来的研究成果是“气候变化时代考古学的呼声：对跨学

科和国际合作的呼唤”。彼得·比尔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借助考古学提升公众有关气候变化对全球文化遗产构成威胁的认识。“考古学对于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与气候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深化了我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理解。”他分享了如何将气候变化的考古学研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科学行动，从而为相关决策者、机构等提供信息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与会学者认为，当前就气候变化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常忽视文化多样性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人类的生存不仅取决于生物适应，还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文化手段应对环境危机和挑战。因此，保护和记录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

历史的经验和智慧

气候变化成为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面对该挑战，考古学视角能提供哪些历史经验？与会学者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在论坛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对气候变化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文明

兴衰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等多项议题进行讨论，展示了从历史中汲取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智慧。

环境变化与早期文明的发展是北京科技大学讲师连蕙茹的重点关注方向之一。她关于“水文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从土壤微形态的视角看良渚古城的兴衰”的研究采用土壤微形态方法，探讨了良渚人如何适应、管理、应对区域水环境以及水文变化与良渚古城建设、发展、废弃之间的关系。连蕙茹的研究样本来自良渚古城内钟家港河道的土壤剖面，揭示了这条城市水道在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堆积组成与水流层序，以及其与近岸台地建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研究还关注了古城内的居住址，并对城外的一系列遗址点和剖面进行观察，以深入了解区域范围内的沉积过程、水文条件演变以及人类活动对地貌的影响。

“研究发现，区域性水文环境从潮间带到低洼湿地的转变，为良渚古城的建造提供了适宜背景；对水环境变化的文化响应促进了和体现了社会复杂化；频发的极端事件可能削弱了良渚的经济基础。可以说，不断变化的水文环境是影响良渚古城的出现、发展和消亡的重要因素。”连蕙茹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张华也将目光投向重大气候事件、海平面变化和良渚的兴衰。王张华的研究通过对杭州湾沿岸多个新石器遗址地层的多指标研究，发现在良渚文化早期，杭州湾地区频繁发生极端风暴事件，风暴和干旱导致杭州湾南北两岸普遍发生盐碱水入侵以及水稻减产。良渚人于此时建造大型水利工程，反映了他们对于不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成功应对。良渚文化末期，海平面快速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良渚古城也遭受盐碱水入侵和洪水泛滥。

王张华认为，良渚早期和晚期的海平面差异，可能是良渚人适应策略成败的原因。根据相关研究数据，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良渚末期的海岸带水涝灾害发展过程可以为当前的海岸带管理提供经验教训。

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贡开世界遗产遗址的气候灾害风险》《安纳托利亚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库尔特佩考古学的启示》……与会学者分享的研究成果也佐证了这一点。

来自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的查尔斯·富兰克林·海厄姆教授关注的是气候变化与吴哥王朝的兴衰。在他看来，吴哥王朝的历史进程与变幻莫测的季风气候交织在一起。在600多年间，吴哥文明在气候稳定时期蓬勃发展。然而，15世纪的吴哥王朝经历了干旱与极端降雨交织出现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因素破坏了水利系统，也造成了后续影响。

延伸阅读

世界考古论坛评选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对世界范围内德高望重、学术成就卓越的考古学家授予终身成就奖。在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获“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等9项获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空间考古研究与环境危机：四十年的探索”等10项获评重要考古研究成果。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获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项目代表冉发林（左）在作学术报告。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气变下的遗产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下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已成为一项全球性事务，也是与会专家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近5年的气候变化更为显著，而气候变化对遗产造成不利影响报道不时见诸媒体。2019年7月，日本南部九州地区一连数日连降大雨，引发鹿儿岛市山林地区大面积山体滑坡，此处的世界文化遗产“寺山炭窑遗址”未能幸免于难；2021年，河南、山西等地强降雨对古遗址、古建筑、历史城镇造成破坏。

瑞士伯尔尼大学考古科学研究所教授阿尔伯特·哈夫纳的研究重点是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致力于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考古遗址的确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这样的威胁主要来自长短期两个方面：一是野火等短期、直接的威胁；二是来自气候变化的长期危险。“比如，由于气温变高，冰川上保存的考古遗址受到了极大威胁。在瑞士，有一处考古遗址，大概有7000年的历史，但由于天气的变化，这些冰川覆盖了数千年的考古素材消失了。”阿尔伯特·哈夫纳举例说。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实验室与科技保护研究所所长张治国分享了关于考古遗址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的思考。他从考古发掘遗址和城墙类土遗址两方面，提出了降水等主要气候变化因素的具体应对策略。“就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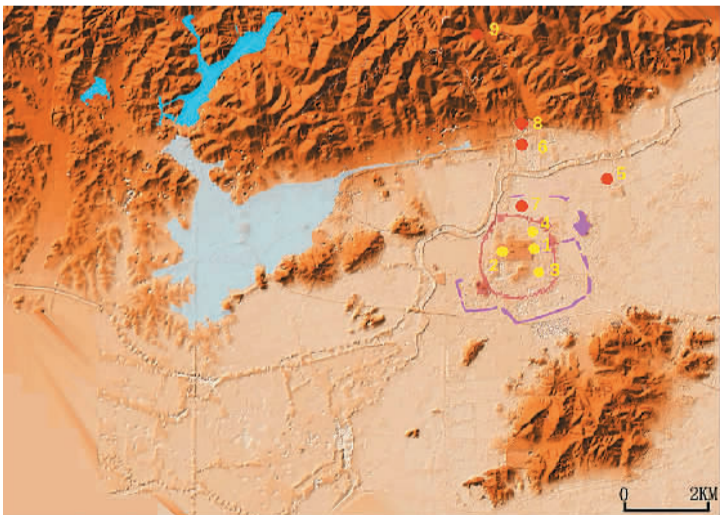
发掘遗址来说，如果是重要考古遗址，可设计并搭建保护棚，保护棚侧面架设挡板，同时建设周边排水设施。如果是一般考古遗址，在风雨来临前用防水布遮盖探方壁，及时用水泵抽排水，防止积水长时间浸泡考古遗址。”张治国说。

就城墙类土遗址来说，张治国建议，在暴风雨预警来临之前，建设遗址周边排水设施，及时用防水布覆盖遗址，如发生滑坡坍塌，及时归拢城墙土，以备回夯使用。

“总体来说，建议提高对岩石类考古遗址的重视程度；加强遗址地气候变化趋势研究与重要考古遗址微环境监测，从定性到定量形成评价体系，明确影响机制；建立脆弱遗址气候变化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实施气候变化对遗址保护长远研究工作等。”张治国说。

链接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国际考古学界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进考古研究、传播考古成果、彰显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自2013年创立以来，论坛逐渐发展壮大，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密切联系的纽带和推动全球考古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北京科技大学讲师连蕙茹关于“水文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从土壤微形态的视角看良渚古城的兴衰”的研究样本取样点（数字标识处）。

受访者供图



日前，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举行。图为与会学者在会议现场观看考古文创产品。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